

394

394

B44-9
790

我知道什么？

死 亡

〔法〕路易－樊尚·托马 著

潘惠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法)托马著;潘惠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3075-7

I. 死… II. ①托… ②潘… III. 死亡-研究 IV. R3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2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我知道什么?

死 亡

[法] 路易-樊尚·托马 著

潘惠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075-7/C·54

2001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7/8

定价:7.50 元

告读者

献给那些近 30 年来,以他们切身的经验及所知让我懂得了死亡、濒死及死后的那个世界的人们。此书是属于他们的。

同时也献给刚刚离我而去的吉泽尔:是她让我懂得了生命。

在法国,每小时有 65 人死亡,而每年则有 560,000 左右具尸体,扩大着死亡者的队伍。人们说是这样说,却并不能亲眼所见。人人都明白他总有一天要死去,却又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这一点。然而,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死亡更明了、更普遍且更不可避免的了:每一件受约于时间规律的事物都是注定要灭亡、要消失的;每一个刚诞生的生命也注定要在那个未知的,却可能是早就安排好的某一天停止生存。研究死亡,便是迎战这最确凿的事实。

可是,出于一种奇怪的悖论(我们还会看到许多

别的悖论),有关死亡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它给我们提出的难以回答的问题便越多。

本书即可反映出这种种的疑惑^[1]。

第一部分

死亡

无论它是否被拟人化了(伟大的死神),还是被用阴性名词(死亡)或是阳性名词(去世、逝世)来表达,死亡都是一种真实、具体、不同形式的数据资料,它流行在众多的领域里。

这一概念是复因决定的;它常常被用各类不同的词汇来描述,以至使人不禁要问每次谈的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当然,这些描述也不乏其共同之处。如果说从感觉、实际经验和想象这三个方面讲,死亡是捉摸不定的,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那么死亡过程的不可逆性则是千真万确的:精力的衰退,身体状况的根本性变化:“每天,我从镜子中观察着死亡的行为”,J. 科克托说道。活着的人们在衰老,在走向末日,生命之火在慢慢熄灭;而死者的身体则腐败、风化,然后,按照福音的说法“化作尘土”。而死亡却并非只有人和有生命之物才有。它涉及到与时间有关的一切事物:分裂变化的社会,衰落中的文化

制度与种族,用坏后变成残渣碎片或残垣废墟的一切东西,而天上的星星则有两种死亡方式:或是演变成白矮星,或爆炸后成为超新星^[2]。

本书专门从人类的角度来讨论肉体死亡或叫做沦为均质和触及到肉体机器的熵^[3];讨论最终成为尸体,这是一个长长的形态死亡的归宿(冷却、僵化、青紫、瘀斑及腐烂、矿化的最后阶段)的生物死亡;讨论心理死亡,即“疯子”;最后,讨论人的社会死亡,它表现为对人进行监禁或精神病治疗,要人养老退休(defunctus),将人遗弃在养老院及福利院里;我们可以将它和精神死亡,按民间基督教的原理,就是犯了死罪的灵魂的死亡联系起来。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按人类的实际经验,可以说老年痴呆便是人的清醒意识的死亡,或是持久的昏迷便是人的短暂意识(并非绝对)的死亡;生命的衰老便是人的旺盛生命的死亡,或超昏迷及脑死亡便是生命的死亡;就像人被流放或被判死刑是他的社会生活的死亡一样。人还可以对自己来说已死亡及以自杀结束生命。

死亡的这些表现都是相似的。人们从中总能发现割裂这个字眼。因此,死者和服丧者便从身体上和社会上被活人的世界所摈弃。不悔改的罪人被驱逐于教会之外。精神错乱者被象征性地从语言上降服(如被标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并被关进精神病医

院；丧失生产力者无人要。罪犯和少年犯则是“边缘人物”，人们力图通过判刑减少他们的危害。造成这些空间距离必须有个执行者，不管其自愿与否：这便是妨害生命的交换的自然环境，破坏器官平衡的疾病，杀人者或自杀者，适者生存的社会。因为这些都是牵涉到一个受害者：即在坟墓里腐烂着的生物尸体，入了地狱的灵魂或永远游荡的幽灵及被驱逐者，一具真正的社会死尸。

第一章 集体死亡

在涉及本书的主要内容,即生物死亡及其引起的各种生物的、心理的及社会的后果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说一下集体死亡。集体死亡的形式很多。我们且将大规模的流行病,各种天灾或人祸撇开(造成土地寸草不生的各种天灾人祸),而只看看战争和社会或文化的死亡。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人不是在死亡着;即被杀或由自己死去。

I. ——战争

造成人类死亡的最人为的原因之一可能便是战争了,它既满足了人的好斗性——人是惟一能制造杀人武器的生灵——同时又起到了调节人口增长的作用:人们曾谈到过战争造成婴儿出生的断层期。战争,由于它所起的破坏作用,也被与浪费和牺牲联系在一起,“死结,”G.

巴塔耶说道,或还叫作“死亡与生命协调的表现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使得8,538,315名士兵丧失了生命。而在1940—1945年的战争中,单是死亡和失踪的军人就有1600万(确切地说是16,687,000人,其中5,318,000人是轴心国成员,11,369,000人是盟军成员);非军事人员的死亡也很多(轰炸、复仇、集中营);总计有24,290,000名受害者。最后,朝鲜战争造成了810,000名军事及非军事人员死亡;越南战争使得1,050,000名军人和510,000名老百姓丧生,阿尔及利亚战争又葬送了1,400,000条人命。内战与民族战争期间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变化也同样很能说明问题:这些战争不断地发生:1820—1859年间发生的92次战争中有800,000人死亡,占当时世界死亡人口总数的0.1%;1860—1899年间,发生的106场战争中共死亡460万人,占0.4%;1900—1949年间,发生的117场战争死去4,200万人,占2.1%;到1950—1999年间——我们进入了发射领域——如果按这样的节奏下去,可能会有40,600万人在120场战争中被

杀,占 10.1%;最后到 2000—2050 年间,将在 120 场战争冲突中有 455,000 万受害者,占 40.5%。人口爆炸、饥饿、污染、穷富国之间的差异,原子弹及如今危险地风靡第三世界的武器竞赛,这种种的一切,会不顾“缓和”的效果,使人感到这些不吉利的预见并非是无稽之谈。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话:由于失误引起的原子弹爆炸(科学幻想已虚构出好几种大概的情节),患有偏执狂的国家元首按一下红色的按钮……因此,从本世纪初起,每千人中有九十人死于战争或由于战争而死去,而上世纪是 15‰;估计自人类诞生以来,各种战争冲突使人类丧失了 35 亿条生命!

因此,必须承认,战争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社会机制,它由一些被分离出来的社会机构来执行,它追求一种多价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最主要的方面就是破坏了人口增长:死亡人数大量增加;出生率下降;由于男子的减少,而导致年龄金字塔的老人和妇女的这一边的增大。不过,现代战争中空战——更何况是原子弹的空战——及妇女的发动,使得后一特点有所减弱,

而我们知道,如今战胜者的损失可能大于战败者(苏联 750 万,德国 300 万)。战争毁坏的是国家,而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

II. ——文化与种族的死亡

从对罗马人的兴衰原因进行思考的孟德斯鸠到今天的战争学家、历史学家、人口学家及人类学家经常对社会及文化文明的衰亡进行思考。这是一个内因(正在消亡的群体的性质)及外因(与另一种具有强烈破坏性的社会或文化的接触方式)的复杂较量,它阐明了当今某些社会出现的蜕化状况。人类学家指出,其实这些衰亡的群体经常分化、瓦解,因为它们没有实实在在的目标和作用,或是因为它们自身的成员认为它们不具有可以到达它们的目的有效的方法,或者还因为它们不能激发起足够的情感上的认同。实际上,那些人口减少、自身已经分化并互相对立,没有能力实行自身的转换或向另一个社会开放的社会,由于对它自身的社会文化价值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或者,和这一样

的,痛苦地感受到了它们的脆弱性甚至它们的无用,只要它们一受到通常由国外传入的酒精,结核,梅毒的侵害,便可能在短期内灭亡,除非发生奇迹。我们不用害怕证实这一点,火地人及火地岛上的各种土著人,斯里兰卡的维达人,萨哈林岛及千岛群岛诸岛上的阿伊努人,下加利福尼亚州及巴西的印第安人,玻利尼西亚的一些极小的部落,都有可能将会被从地图上划掉,就像塔斯马尼亚人昨天曾经遭遇的那样。大部分的时间里,内因紧紧依靠一些有意或无意的外来破坏过程而继续着。就这样,阿伊努人和日本一道,最初经历了一个在技术上被日本人借鉴的时期(带有或不带有工艺上的剽窃),然后又经过了一个互补性的技术—经济紧密结合的时代,以后似乎进入了一个与日本人相依为命的殖民阶段;幸存者只剩下两条出路:或是在衰败与贫穷中继续生存,或是成为日本人。恶劣的气候条件(赛尔陶、卡拉哈利、火地……)也可能会加速灭亡的进程。但别忘了,不管怎样,这些人民在生态上无疑是适应(或称适合)并达到了一种真正的内在的和谐。精确地

说,他们与占优势的群体的意外接触所打破的,正是这个双重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了灭亡或至少是衰败的可能性。破坏这些社会及文化的方法很多:屠杀或同化,驱逐或限制在保留区内(划分出一定的地方,限定其在此范围内活动);利用或是消灭,可能的话,使其绝后。巴西森林中原有好几百万印第安人,如今所剩已不到 10 万了。实际上 20 年来,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国家里,我们目睹了一场真正的种族文化的灭绝,这正是印第安人保护局犯下的罪行。人们对阿里皮亚河发源地附近的 Cintas Langas 部落实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灭绝政策作过报导:在 Quarup 节那天(死人和活人的盛大节日,这天要演出一些神话)轰炸中心村,使用雇佣杀手,其头目通常是些异常残暴的性虐待狂。另一种毁灭方式也不逊色,哪怕它似乎考虑到要施行得宽厚些:即对印第安人施行的围禁或称为“征服”政策,按照传教士的说法,这种政策旨在拯救灵魂以及向基督教徒传授农业、牧业、艺术和犹太基督教文化的神圣的道德标准。它的首批成果便是引进了传染病(天花、麻疹、伤寒),而

随着水污染而来的是腹泻和痢疾。更为严重的是迫使印第安人抛弃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神、他们的信仰和所有的道德准则及他们的传统，同时，借口保证风俗的纯洁性，将妇女与男子分开，有时甚至夜里将她们关在臭气冲天的监牢里。同样，对于被放逐到特雷萨（马托格罗索南部）保留地的博·罗·罗人来说，比起他们领地的狭小、猎物及鱼的稀少（丛林及河流已预先被一些贸易公司非法地掳掠过），和对政府要将他们改造成牧人（这都是些优秀的猎手、渔民、种田人，对放牧一无所知）的担忧来，现在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传教士强行禁止他们跳舞、唱歌、吸烟，不准在他们的居住地举行他们的丧葬礼仪活动。

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没有比剥夺一个民族的文化、它的根、它的道德准则从而否认它的身份更可怕的死亡了。

第二章 个体生物的死亡

生物死亡或称个体生命的消失和能量压降到零,是指生命机能完全、彻底即不可逆转^[4]的停止,尤其是在脑-心-肺这个三角区;机能协调的消失及紧接的组织及细胞单位的逐渐死亡。它活动于细胞、器官、机体范围内和人的统一性/特殊性的范围内。因而它包含生命的组成元素返回到生物圈这个生命再生的无尽源泉的共同基地。人为什么会死亡,死于什么,怎样死去,这始终是些不大容易回答的基本问题。

I. ——一种困难的方法

1. 死亡作为悖论的数据资料——如果不是因为急于要确定摘取器官,下葬及火化的有利时机的话,对于死亡便很可能不会有合法的定义。死亡,其实不就是那种无论从标准还是从定义上任何科学手段都无法划定的大写的“无”,或几乎是“无”吗? 此

外,对死亡的科学认识越进步,就越是难以确定它什么时候发生,又是怎样出现的。但,正是在这个“无”上,人们集中了所有的忧虑、调动了所有的精力来排斥它、淹没它、消灭它或是收回它。

死亡是日常、自然、偶然而又普遍的。——死亡是日常的。但它似乎总是遥远的,尤其是当人年轻时更是感觉如此。这是别人的事,哪怕我自己时时都在受着死亡的威胁:“死亡并不需要任何东西,动脉里的一个血块、心脏的一阵痉挛,便能立刻把你从这个世界送到那个世界去”(V. 让盖勒维茨《死亡》)。——死亡是自然的。然而,它却像是一场侵略:事故总是乘你不备时对你搞突然袭击的,它像一场蛮不讲理又突如其来的事故一样,看得见、瞧得着:死亡尤如没被驯服过的大自然,无情、无理、荒唐;只有“服从、顺应规律”的死亡才是善终(J. 博德里亚尔,《象征性的交换及死亡》)。——死亡一直是难以确定的。死亡的确实性和死亡本身的难以确定是互相对立的。死亡从来都是不能预料的,它总是多余的,它来自于偶然和未预料之中:“您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时辰、地点”,福音传教士说。现在,由于统计学和医学技术的进步及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知识的传播,人们可以科学地确定死亡,不论是自然死亡、事故死亡还是自杀。——死亡又是普遍的。每

一个活着的人,每一个注定要灭亡、要消逝的生命,都从某种程度上将死亡平常化了。但死亡又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一旦时辰到了,谁也替代不了我,而我死的方式又不会与他人相同:“我们每个人都是第一个死的”(E. 约内斯科)。——简言之,死亡是无法归类的:“它不能分类,是个特别零散的事件,独此一类,特别孤立,与所有存在于时间里的其他事件毫无关联”(V. 让盖勒维茨同前书)。

2. 死亡的时间——没有比从时间上确定从生到死的过程更难的事了。除了对于必须开具允许火化或下葬证明的医生和必须找出死者停止生命的时间的法医来说外,死是没有什么精确的瞬间的。确实,人是渐渐地死去的,不仅对生命垂危者是如此,对于暴卒者也是如此,死是逐步逐步地、又是部分地进行的:死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们也同样应该赞同比沙的那种十分巧妙的说法——它比一个简单的同语反复说得好——如果生命被看作是抵抗死亡的功能的总体的话,那它便更是我们花来死亡的时间。因此,除了 *mors ipsa* 并最终成为尸体的和正式给生命一个结束期死亡本身外,还由于死后死亡形态继续存在(具体的数据),人们将自卵子形成直至临终的第一阶段一直与生命过程共存的